

台 港 澳 之 窗

一百多年来香港中医药的演变

香港 谢永光

从 1841 年英国人接管香港,至今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现将本港中医药行业在这期间的演变, 作出一个概括的总结。

一、医药登记条例始于 1884 年

香港开埠初期, 居民有病, 都是用中医中药来治疗。英政府式统治香港时, 曾作出承诺, 尊重中国人的传统风俗习惯, 保留华人有应用传统医疗方法行医的权利。华人在香港用传统医术行医, 当局不加干预, 亦无立例管制。执业中医无须向医务卫生署办理登记, 只须向税务局办理商业登记即可挂牌行医。由于中医资格无一定标准, 任何人都可自称中医悬壶问世, 造成庸医充斥, 中医学本身亦受到贬损。按照现行法规规定, 中医只能使用“中医”、“中医师”、“中医生”、“国医”、“唐医”等名称, 不能使用“医生”、“医师”、“医务所”、“医疗所”等西医习用之名称。中医的“钦定英译”Herb Alist, 意译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 这种职称未被承认为“医务人员”的范畴, 没有社会地位。

香港有医药登记条例, 始于 1884 年, 颁布这条法规的用意, 是要确定西医的标准, 并非限制中医中药。规定凡用西法行医, 必须依法登记。但该条例第三条, 注明中医不受该条例限制。马沅的“医药登记暨孙中山先生与香港法律及医学之联系”一文, 对当时医药登记和中医在港行医的情形, 有如下的叙述:“当香港开埠之初, 西洋医术尚未普遍于中国, 惟本港的定例, 西医执业必须依章登记, 始许问世, 于是有医药登记条例之施行。该例颁布于 1884 年为是年第 1 号条例。迭经 1893 年第 4 号、1897 年第 1 号及 12 号, 1914 年 31 号及 1923 年第 2 号修正。至 1935 年 41 号重订。当局制订该例, 当以本港地方、中西医术各立门户, 而华人习于中医, 故有第 3 条华医不受该例限制之规定, 特予华人以自由悬壶问世之权。一方则于西医执业, 严加取缔, 盖以重人民之生命也。然其对西方医学尚未灌输于本港华侨, 在港业西医等皆西人, 而就诊于西医等亦尽属西人。乃越数年, 始有香

港华人西医学校之设立, 以西方医学教授华人, ……”

从“开埠”到 1945 年, 实际上负起保健工作的是中医, 而以在整个十九世纪里最为显著。关于中医在香港早期担任实际的公共医疗工作, 我们亦可从第一家使用中药为华人治病的东华医院的开设, 从而得到证明。东华医院于 1872 年开幕, 当时医院不仅门诊部全用中医诊症, 施药部分亦用中药。至于留医病人, 也是服用中药, 医院内设有中药库和一个煎药专用的大厨房, 里面放有数十个风炉和茶煲, 用以煎药给病人服用。一些没有地方煎药的贫苦病人, 即使不留医, 也可在院内等候院方煎药服用之后才离去。这种服务维持很久, 直到 1941 年香港保卫战爆发前夕, 仍然保持。东华医院中医药部门的发展和演变, 可以反映出香港中医事业的盛衰。

1896 年时, 香港人口已增至 24 万人, 中医门诊平均每年为 11.615 万名, 即超过 45% 的人口, 就诊于东华医院之中医。

二、1940 年是香港中医药业巅峰时期

1940 年是香港中医药业的巅峰时期, 当时东华医院聘用驻院中医 16 名, 每日赠诊街症(门诊) 3 小时。三院赠医施药每日统计, 中医约 8 倍于西医。自从“七七”芦沟桥事变后, 大量华人从中国内地迁来香港, 至 1940 年, 香港人口已超过 150 万人。庞大的人口, 需要医疗服务, 于是便增加了东华三院的负担。每天数以万计的病人, 涌到东华医院去看中医。为了应付繁重的工作, 当时三院将药方编成一本《验方集》, 将各方编成固定号码, 医生在处方时, 只写处方的号码, 病人便可拿到药房去取药, 在工作上收效迅速, 这是改良方法之一。其次是将药方的药剂, 改为研成粉末, 病人不用煎药, 改用药散吞服。由于服药末所需的份量, 可比煎剂减少药量, 又可节省该院的消费, 这虽是在形式上改进中药中医, 但也是香港中医中药改进的开始。

1937 年 10 月广州沦陷, 广州汉兴中医学脱迁澳门, 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迁香港, 在跑马地找到新校址恢

复上课,校中教职员大批南来,由陈任枚当校长,周仲房当教务主任,讲师包括有吕楚白、罗元恺、刘赤选、朱愚斋等人,俱属一时硕彦。当时港绅何甘棠(何东胞弟)因曾跟随国内名医蔡咏南学习过中医,亦被院方聘为客座教授。人材荟萃,极一时之盛。香港之战爆发后才停止上课。

1942年是香港中医药事业的重大转折时期。太平洋战争于1941年12月8日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于1942年7月成立“总督部香港中医学会”,订定中医资格标准,办理中医登记,容许中医继续行医。另一方面,日本人却认为中药需要煎煮服用,手续烦琐,不适合战时需要,下令取消东华医院中医,只留用原来的西医。有数十年历史的东华三院中医部门,从此一蹶不振。战后东华、广华两院虽然仍保留中医门诊,但都已停止赠施中药,只保留一个不起眼的小房间作象征式的维持中医治疗。

一百多年来,中医药对维护香港居民的健康,曾作出积极的贡献。最突出的一次,是1957年流行性感冒在香港肆虐期间。当时居民罹患本病约十居其三,中西医诊所同时出现长龙。西医对症治疗退热虽快,但不能抑制流感病毒。相比之下,中医药在当时显示了很好的疗效。

自从东华三院停止施赠中药之后,为了维护中医团体赠医施药的优良传统,战后许多个中医药团体特联合其他社团,于每年夏季都举行赠医施药。这个优良传统一直维持到现在还继续举行。

三、五十年来中西医在香港的消长

自从抗生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以后,西医有了一种新武器,中医在内科领域所拥有的优势已不如前。西医出身的张公让先生,1960年5月间曾在《中国新医药》第51期发表《二十年来中西医在香港之消长》一文,文章指出:“据老一辈的医界一般意见,二十年来中西医在香港是中消而西长。二十年前每一条街道,都有很多中药铺,西药房则寥寥无几。但是二十年后则中药铺日渐减少,西药房则日渐增多;中医生的生意也是如此,中医生的生意日渐减少,西医生的生意则日渐增多,尤其是西医廉价诊所设立以后。……”

我们日常诊治的疾病,可以说80%都是传染病,即中医所谓时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抗生素还未面世,中医治疗此类病,成绩胜过西医。但自从抗生素面世以后,中医即屈处下风。香港医界中消西长的另一原因,为中药价钱太贵。此种情形在六十年代更为突出。

香港中医多采用学徒式传授新人,战前潘陆仙、陈伯坛、陈庆保等人都曾设帐授徒,但设备简陋,教材贫乏,无法与今天大陆、台湾的中医学院相比。中医团体公开设中医药讲座,最先由中华国医学会(香港中医公会前身)卢觉愚等人提倡。香港的中医学院多在夜间上课,战后成立的中医学院有多所,包括王道、汉兴、现代、复旦、香港及各中医公会附设的学院等等。现在仅存的除中医公会会立学院之外,仅有中国国医学院、普华中医学院两家,历史也最悠久。

香港中医药界的学术风气一向淡薄,中医界的学术研究工作,并无外界资助及民间团体的支持,其成绩只靠个人志趣和努力苦研苦练得来。囿于种种条件,在科研工作中难有大作为,远远落在中国内地和日本之后。在这个艰苦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搞好中医教育工作,使海外中医命脉得以延续,或是有个人的著述刊行面世,这种成绩已经很了不起。

战后中文大学成立中药研究中心,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多次举办过中医药课程,有些中医药团体经常举办中医药展览,市政局图书馆长期与中医团体合办中医讲座,新近成立的香港科学馆也有中草药、针灸部分材料展出,对扩大中医药的影响有一定的作用。

中医杂志战后出版过多种,其中以陈居霖主办的《现代中医药》、张公让主办的《中国新医药》两种月刊流传较广。直到六十年代初期,由于销路不前,终告夭折。

四、与外地展开交流从五十年代开始

五十年代初期,国内外名中医学者大批涌到香港定居,南北人材荟萃,这是香港中医人材最鼎盛时期。1953年间,香港中医界首次与国际东方医学者展开交往,西德针灸学会副会长许米特博士(Heriber Schmidt)东渡日本,以一年时间学习中医《伤寒论》。是年3月途经香港返国时,香港中医药团体联同在湾仔英京酒家作出盛大欢迎,赴会的中医界人士达三千人之多。

1955年4月2日至3日,日本东洋医学会在日本京都大学召开国际性学术大会,香港有些中医团体首次接获此类国际性学术大会的请柬,笔者个人也接到此项邀请书。从五十年代开始,香港已逐渐发展成为国际重要商埠,国际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此后香港的中医界不断组团到外地展开交流活动,但以这一次为开端。五十年代中期,香港针灸界邀请日本针灸名家谷义雄博士一行10人来港讲学,为港日两地学术交流奠下基础。

七十年代由于世界掀起“针灸热”，加上此地一位脑科专家创造针刺戒毒成功，引起世人瞩目，给针灸中医界带来一片空前未有的兴旺。短期培训针灸班的设立，有如雨后春笋，不少外国人专程来香港取经。

虽然针灸的疗效已被世界卫生组织承认，但香港的中医针灸专家还未获得应有的地位。1985年7月16日至19日，世界卫生组织在香港召开“针灸穴名标准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针灸学会派出庞大的代表团来港主持会议。作为东道主的香港，有关当局推派出席的代表只是西医，并非对针灸学独有专长的中医。

七十年代末期，大陆开始推行开放政策，八十年代中国大陆与香港中医界的学术交流增多。1984年8月香港中医界首次参加全国第二届针灸针麻学术研讨会。1985年笔者以香港代表身份参加中医研究院30周年院庆，同时应该院图书情报中心三届学术年会之邀在会上作专题报告。这是香港中医首次上北京作学术交流。1986年11月20日至22日，中国中医研究院在北京召开“中医证的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少数外国学者被邀请参加，香港方面有笔者和刘祚田老中医两人被邀请出席。1987年12月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世界针灸学术大会期间，笔者应中华医学会、苏州医学院邀请作专题报告。1990年9月赴福建泉州讲学。1990年11月全国第一所针灸陈列馆

在长沙市湖南中医学院成立，笔者被聘为针灸陈列馆顾问兼湖南中医学院客座教授。香港与国内中医药学术交流向前跨进一步。

五、中医药合法地位八十年代末确立

八十年代末期，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稿进行咨询定案期间，曾经发生过基本法草稿内有关医疗服务的第6章第145条其中“促进中西医药发展”被删除，在中医药界人士大力争取之下，此项以法律形式承认香港中医药合法性的条文终获得保留。由于发生多宗中药中毒事件，港英政府为了研究香港中医中药的管制问题，成立中医药工作小组。并于1990年9月成立“专业咨询委员会”，收集公众对中医执业资格、中药的化验及监管问题的意见。卫生福利科建议成立一个法定中医药委员会，其中包括中医代表，负责向全港的执业中医师办理注册，以及统一中医师执业的资格，提高中医的专业地位。将来只有注册中医师才能挂牌执业，当局将会制定中医师名册，让市民知道自己就诊的中医是否合乎专业资格。当局亦已制定了45种称为有毒或烈性的中草药将受管制，市民必须持有注册中医的处方，才能买到这些中草药。

踏入九十年代，中医药界先后多宗令人瞩目的事件出现。第一宗是全港中医师公会联合会成立。第二宗是香港中医学会成立。第三宗是国际中医药学术研讨会在香港首次召开。这都是令人兴奋的事情。

• 新书出版消息 •

常见病中医异治 郭教礼等编著，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书中就30余种常见疾病的异治方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使读者能知常达变，拓宽思路。全书18万字，每册4.50元（含邮挂费），欲购者请汇款至陕西中医编辑部（710003）郭教礼收。

内经新论 王洪图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该书反映了当代《内经》研究的水平。欲购者请汇款（每册15.50元，含邮挂费）至山东省济宁市中医院（272137）曹兆厚收。

新编方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医文并茂，便读易记，切合实用。欲购请汇款（每册4.50元）至湖南常德四医院（415000）何足道收。

医药卫生量和单位的正确使用 本书遵照有关国家、国际标准及ISO、WHO等的有关规定，介绍了量、单位、单位换算等的基本规则。由李家福等编著，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发行。每册定价8.9元（加邮资1.1元）。购者请汇款至2300202天津（西）印刷道40号，天津创疡所李家福。

中国药茶 由上海中医学院茅晓编著，已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由药茶概况、药茶配方、成品药茶三部分组成。该书定价4.55元。需者可向各地新华书店或上海科技出版社门市部购买。

《绍兴本草》、《宝庆本草折衷》辑校本 《绍兴本草》是南宋唯一的一部官修本草。《宝庆本草折衷》是南宋优秀的本草书。以上二书自成书以来从未刊行过。今郑金生等（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东直门内，100700）将此二书辑校印行。欲购者请与郑金生联系。

安徽省高校联合培训部

中医函授部招生

学制二年，选用全国统编高脱函授教材，针对自学考试开设12门中西医课程，各科均由中医专家教授辅导教学。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均可报名。汇报名费3元至合肥市阜南路48号高函部。即寄简章和登记表。邮政编码：230001。